

教育

為澳門教育改革再進言^{*}

劉羨冰^{**}

一、教育改革的必然性和緊迫性

教育改革的呼聲響遍全球。

在教育普及程度相當高的，已在不斷改革的美國，2000年1月克林頓總統最後一次國情諮文中，他面對全國電視直播高呼：“美國需要21世紀的教育革命”，以追求每一個兒童都能以學習為指導方針。除了信息科技外，美國將繼續1993年開始的頭腦啟迪計劃（Head Start）增加10億美元，讓0-3歲幼兒得到優質的早期教育；用25億美元增聘13萬新教師來減少小學班級人數；建議減稅300億美元，鼓勵大學生完成本科課程（美國的高中生升大學比率從1993年的57%增加到67%，但退學率達37%），還撥款推行“促進成長計劃”，鼓勵處境不利的年輕人修學後進入高等教育。

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財政預算減縮了20%，但為了教改，教育費卻增加了20-30%，以加強資訊科技教育和公民教育。

台灣從1996年開始，執行跨世紀教育改革計劃，制訂了十二項行動方案，五年內投入特別費1571億新台幣（相當於澳門幣400億元），計劃從幼兒教育到成人教育系列改革，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分期取消升高中會考及大學聯考，增加學校自主權，以回應“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等民間訴求。

香港回歸三年，教改措施多項出台，提出了新的目標，也作出了可觀的預算，向敢於創新的教育機構提供支援和鼓勵。

在內地，1998年教育部頒佈《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不少實驗學校做出良好的試驗，不少改革性的舉措在施行，名牌大學在合併，高等院校千方百

* 從1999年中至今，為特別行政區教育路向探討、施政方針，為21世紀澳門教育的改革，作者先後寫了六篇文章，約三萬五千字，本文是新的一篇，專為《行政》雜誌寫。

** 澳門中華教育會監事長、澳門教育委員會委員、澳門學歷認可委員會委員。

計擴大招生，在繼續加強素質教育的同時，高考也開始了3+1的改革。（即減少入學試科目，只考語、英、數三主科及對口專業一科）。

各地教改決策，許多國家都把振興教育作為面向21世紀的基本國策，都不是巧合的，大家都有共同的、深刻而迫切的客觀需要。

二、教育改革的時代性和社會性

第一，教改是科技高速發展的必然回應

火的使用把人類帶進農業社會，也開始了封建教育；蒸汽機的發明使人類進入工業社會，普及教育、平民教育取代精英教育和貴族教育；資訊科技帶出知識經濟、地球一體化，資訊社會自然需要教育社會與之相適應。21世紀就是人類構建教育社會的年代，也就是一個教育革命的年代。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給人們一個信息，知識經濟、信息科技是無遠弗屆的，閉關自守已經是現代的童話，地球一體化的大潮已湧進21世紀之門，教育已經沒有原地踏步的可能了。這是時代的變革，澳門教育更要急起直追，否則將窒礙了幾代人的發展，將窒礙了澳門對外競爭生存能力的成長。

第二，教育改革是20世紀反思的成果

人類經歷了兩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又陷入了後工業化社會的困境，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貧富懸殊……面對種種危機，從深刻的反思中，體會到不少問題的根源在於道德的失範，最大的災難是人為的。因而紛紛感到20世紀品德教育的失誤與不足。哲人提出我們的未來，是教育與災難的競賽，把未來的厚望寄托在新一代人格的培育上。澳門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也上升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對澳門未來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文明進步，無一不繫於新一代身上。對教育的期望越高，也就是教育必須改革的社會動力。

第三，教育改革是千家萬戶的呼聲

亞洲還是應試教育影響深遠的地區，半個世紀以來，課程下放，教材加深，增加課時、增加作業、增加測驗、書包揹不動，兒童好奇好學的天性被扭曲，厭學、逃學、留級、以至棄學淪為街童，不幸的淪為童黨，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追本溯源，救救孩子還要從教育改革開始。千萬家庭在呼喊，還兒童歡樂的童年！千萬個教育良心在折騰，為甚麼學校不能成為孩子的樂園？澳門師生同樣背負着沉重的擔子，同樣處於惡性循環之中，只能靠教改解決出路。

第四，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該還有自己的教改動機

特區教育應該適應《基本法》的原則精神，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法定原則為基本，改造經歷了127年（1849-1976年）的殖民主義

式的管治，以及23年（1976－1999年）的新教育施政所形成的原有教育狀態。清外人管治的殘餘，立全民教育的根基，是一個教育性質的大變革，既是全民教育，今後必須“帶好每位學生”、“一個不能丟”。因此，教育行政必須清晰交出功課，才能進一步把一個葡人管治的架構改造為澳門43萬居民服務的社會公器。

因此，澳門要進行教育改革，並不是跟風湊熱鬧，而是比任何地方更需要、更迫切。是來自實際需要而與世界潮流呼應，是回歸重任在前而被擱下來的“應辦未辦事”，隨着特區成立，它的迫切性必然顯示出來，從回歸日開始，社會在期待特區政府如何因勢利導，如何奠定新的教育基石，為四十多萬澳人提供澳門全民教育的第一章，對2000－2001年度的施政方針將拭目以待。

三、更新教育目標 育一代新人

教改是一種橫繫千家萬戶，縱貫特區實力發展的工程，必須是科學的、社會共識的，有長線計劃而又有穩妥步驟的、有充足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配備的行政舉措。但是，作為起動，必先訂定新的教育目標，換句話說，必須對應四大教改動機，來確定和更新育人的標準和規格，明確教改要培養怎樣的澳門居民：

第一，具必備的知識和自學的能力

我們為適應21世紀知識經濟，信息科技發展，一代新人必須掌握必要的知識，還須具備自學新知的能力，全民必須不斷提高文化素質，澳門才能具備發展一個具競爭力的、對外開放的、以旅遊娛樂事業為龍頭的城市，並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人力保證。

第二，具時代意識和健全人格

為了適應全球一體化的國際趨勢，爭取世界和平與發展，一代新人必須培養公平競爭意識、開放意識、平等意識、合作意識、理性思辨和創造性思維；要樹立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樂於當負責的地球村民，以建設人類的持久和平以及無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的樂園為理想。

第三，能充分發展和終身樂學

為了提高教育教學的科學合理性，讓下一代不但會學而且樂學，教師不但博學而且善導，學校生活不能像在零件倉庫裡搬運死知識，學校應辦成生動活潑的生物園，讓學生從生機勃勃中感悟科學規律，激發好問好學的本性，充分發展，使知識轉化為智慧，使間接知識轉化為直接經驗。因而課程、教材、教具、教法都要因應教育目標的更新而更新，才能培育出能充分發展潛能而又終身樂學的一代新人。

第四，具民族觀念和自主意識

全民教育代替外人管治的教育，根本區別在於把順民教育改造為主人翁教育，官員改造為公僕，官僚機構轉變為社會公器。政權的和平移交、公務員集體過渡，也就留下一個自我改造、自覺完善的空間。另一方面，特區的建立與鞏固，亟待居民凝聚力的加強，公民意識的培養，始建於從小的自主意識。“一國兩制”不但是法律的概念，還是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長期薰陶。因而應有教育性質的重新確立，教育法規的檢討與修訂，教育政策的調整，還要有新的舉措才能適應。這都是教育行政方面的改革繼而推動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教育，逐步樹立民族觀念和自立意識。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教育內容必須更新，對下一代的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同樣要加強。同時刪去過時落後而不必要的內容；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教育教學手段和方法必須更新。第一、第二課堂的有機配合，多媒體、信息高速公路的運用，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精到，裏面已包含了大量教改的課題，蘊藏了許多釋放學生潛能的空間；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終身教育的建構，學習社會的形成，必然在教育結構上，在學校類型上，在課程組織上，在方式方法上……會帶來教改生機。有志鑽研教育科學的教育工作者也將有無限開拓的空間，可以大顯身手，追尋理想，師生均得到解放。

四、教改宜民間試點 穩步探索

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的教育改革有廣闊的空間，所缺的是鼓勵、支持、組織和引導。針對澳門教育的現狀，特別要考慮澳門教育的特色，我在2000年5月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與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合辦的研討會上發表了《回應時代要求 針對地方特色——澳門教改建議》中，提出教育行政應在教改中扮演支持者、鼓勵者、組織者的角色：“我認為最佳的決策是：積極開展輿論工作，上下一心改變舊觀念，鼓勵民間自願改革，政府分擔改革風險，着眼未來，穩步探索，引進各地成功經驗，結合澳門實際；歡迎民間選點進行教改，探索一個試點班，一個試點科，一個試點項目均可，積小改小勝，逐步推廣，以便等待時機、全面、整體改進”。

我認為，自上而下的，由教育行政總體領導全面的教改條件仍未具備，況且改革必有風險，對育人工作的風險必須慎之又慎。

首先，全世界至今仍未有一個成功而又成熟的教改先例，即使某些方法顯出優勢，但具體條件與澳門不一樣，引進而成功的可能性需細心研究。分散教改試點，也是分散風險，較為穩妥。

第二，澳門教育具有許多特色（詳見本文附的《澳門教育概況與特色》），私校學生佔93.72%，而且四種學制並存，各有其歷史源流，又各有其適應性。澳門學生多渠道銜接升學，高中畢業生80%以上有暢通的升學渠道。大多數私校十五年中學、小學、幼稚園“一條龍”，私校中規模、設備、師資、管理上都有差異。教育理念也不盡相同，有利分散試點改革。

第三，私校自立性強，家長選擇學校的自由度大，而且家長與學校的相互關係較稠密，容易取得共識與默契，利於取得共識，推動校內改革。

第四，澳門無統一考試，法定的課程大綱只有原則性的規限，具體細節具有相當彈性，私校基本教學自主，民間志願改革的可行性大於統一的改革行動。

第五，澳門教育在相當程度上有對外依賴性，高中畢業生超三分之二在外地升學，在課程銜接上處於被動地位，這也是不適宜行政統籌整體進行改革的。

五、創造條件 積極推行

教改的推行，必須創造必要的條件：

第一，爭取家長——社會的共識與支持

教育是社會工程，要進行改革，沒有家長的贊同根本不能起步。首先要從時代發展、社會需要、教育科學規律、21世紀發展趨勢與家長共同探討21世紀人才的特徵，有了共同的育人目標才能同心同德進行教改的探索。

第二，教改實踐必須具有較高的專業含金量

教育是科學，教育實踐必項符合科學規律；教育是藝術，教育方法應具教育魅力；教育是愛心事業，施教者必須熱愛教育對象。教育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師愛的摯誠三者在教育實踐中的發揮，我稱之“教育專業含金量”。為教改的順利試驗，在師資和管理上能挑選含金量較高者承擔參與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官方的鼓勵、支持是重要的動力

試驗要承擔風險，單靠民間熱心人士的力量，難以推動教改，行政當局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力量。建議政府作出獎勵資助計劃，鼓勵民間積極參與，明確權利與義務，政府出錢，民間出力，充分調動官方、校方與家長三方的積極性，減少阻力以利推行。也只有官方明確態度，作出具體的支援才能增強信心，減少風險。況且官方掌握全面情況，便於對外聯繫溝通，還可以通過協商邀請、組織私校參與具體教改項目。

第四，要訂出盡可能穩妥的計劃

教改不能像醫學那樣先在小動物身上先作試驗，教改的計劃必須進可攻，退可守，不能拿學生當犧牲品。因此，必須訂出盡可能穩妥的計劃，設計可行的方案，定期檢討，及時修訂。學校領導也必須重視，還應配備足夠的人力和物力，能有一個關注的小組共同負責則更好。

沒有嘗試不可能有成功，嘗試的結果有可能是失敗，教改應容許失敗，但不能在學生身上造成失誤。這是教改的一條底線。儘管如此，澳門熱心的教育工作者一定會找到有時代價值的教改空間，在新的歷史時期，因應新的歷史課題，作出新的貢獻！

附件

澳門教育概況與特色

一、澳門教育的概況

1999 – 2000年度，全澳中、小、幼以及特殊教育學生共98,964人，教師3,846人。連同高等教育學生全澳學生約佔人口的比率為23%。詳見下表：

表一：按官、私校分類統計之學生、教師、教學班（高等教育除外）

1999-2000 澳門地區	學生數及比率		教師數及比率		師生比	師班比
全澳合計	98964	100%	3846	100%	1:25.73	1.65:1
官校	6213	6.28%	369	9.59%	1:16.8	1.60:1
私立葡文學校	1068	1.08%	74	1.92%	1:14.4	1.51:1
私立中文學校	85159	86.05%	3146	81.80%	1:27.1	1.66:1
私立英文學校	6524	6.59%	257	6.68%	1:25.4	1.60:1

表二：按等級分類統計學生人數（高等教育除外）

1999-2000 度澳門地區	學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特殊教育
學生人數	16162	46933	35316	553

澳葡政府長期不承擔公共教育，公費只辦葡人葡語教育，1978年開始以按班津貼方式資助不牟利私校。

1995年通過加入公共教育網的方式，政府向私立學校推行七年免費教育並於1997年擴展到小學前預備班，小學及初中共十年免費教育。

二、澳門教育的特色

澳門教育頗具特色，四百年來澳門從小漁港向現代化城市的蛻變過程中，不管是華人教育還是葡人教育，也都從少數人專利的封建教育走向了平民化，完成了教育近代化的過程，從而又邁向現代化。看似世界必由之路，實際上澳門確有它獨特的發展軌迹，形成多元化的教育風貌。

（一）強烈的民族性與有限的融合性

對照教育史，古代的東方封建教育和中世紀西方宗教教育，這世界上兩大教育源流在澳門均有各自的支流，兩段小小的支流涓涓400餘載，沖積成澳門教育的地貌。100年前，本地存在學舍、書屋、社學、與大陸清末的教育是一體的，現存美副將馬路的“黃東陽書屋”，以及沙梨頭土地廟“更館社學”的遺址，都是中國古

代封建教育機構在澳門的歷史見證。望廈村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中舉的美事，至今在族人中傳為美談，也記錄在香山縣誌中。當年，與大陸各地一樣，在科舉藩籬下，教育是少數人的專利，勞苦大眾也視十年寒窗，求取功名是唯一出人頭地的機會，但能受教育的，始終是少數人。

同樣，從16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澳門葡人的教育，也源於其民族的傳統，教會辦的神學院，附於教堂的學塾、主日學、要理識字班等等也與歐洲的教會教育同出一源。因此，澳門四個世紀以來，教育思想、學制、學規都呈現中、葡兩制並行，兩條軌道各自發展的局面，也恰恰反映了澳門教育民族性的特質。澳門華人教育在本世紀內逐步邁向了近代化、現代化，但改革的步伐還是追隨着中國教育改革的步履，儘管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地、西式教育的模式不少從澳門傳入大陸，本地開風氣之先，可以汲取西方精華，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學校模式，教學方法等仍與本民族看齊，渾然一體。特別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觀，影響深廣，澳門教育保存其特色，廣大居民對東方傳統文化的認同較深，是澳門教育強烈的民族性的表現。同時，中、葡文化在澳長期的交匯而且有400多年的通婚史，出現了一個數以萬計的土生葡人族群，不同民族的傳統文教在潛移默化中，相互汲取並揉合，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也是澳門文教的特點。

（二）拼盆式的國際性與長期的開放性

1493年，羅馬教皇裁定澳門屬葡萄牙的“傳教權”內，天主教耶穌會士即隨葡商來澳門發展，但經過幾個世紀的變遷，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建立的教育事業，已經是多元的，既有葡國學制的一源，又同時引進了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學制和學規；在神學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國際性更為明顯。今天還存在一所國際性的天主教高等校際學院。

通過教會教育，從1650年開始，澳門已有華籍教士出洋留學，至今教會學校學生已經走通了世界各地深造的渠道，也有國際性的考試從六十年代開始，在本澳設立了考場。（劉羨冰：《澳門天主教教育400年史略》）。本世紀以來，除官校教師大多來自葡萄牙之外，天主教、基督教各會院的傳教士、修女和牧師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少。80年代巴哈伊教在本澳開辦聯合國學校，這些學校在師資、學制、教材、教法和校政管理上，均引進世界各地的。筆者50年代初就讀聖羅撒女子中學，也曾接受英、葡等國籍的修女和教師的教導，個別科目課本來自歐洲。即使在華人辦的私立學校中，也有不少行政人員、教師留學於世界各地，例如1899年在澳門開辦子褒學塾的陳子褒就曾考察日本教育而決心興學育才的；1932年創辦濠江小學的鮑雁波（即鮑華），也是留學日本的青年；1925年在廣州創辦後遷來澳的粵華中學，創辦人廖奉基就是留學美國邊麻大學的教育碩士，1939年遷來澳門的中德中學，校長郭秉琦是留學德國的，中德校政有德國教育影子。追本溯源，儘管澳門教育的主要特徵是民族性，但國際性和開放性也應是澳門400年教育源遠流長的特色之一。

（三）並存式的多元性和靈活的適應性

四種學制長期並存，是澳門教育多元化的根源：

中國學制

六·三·三制

學生佔86.05%

葡國學制	四·二·六制	學生佔1.08%
英國學制	六·五·二制	學生佔6.59%
中葡學制	六·五制	學生佔6.28%

(1999 – 2000年度官方數字作統計)

有人認為澳門四種學制是中國學制、台灣學制、葡國學制和英國學制。我不同意這種分析，海峽兩岸都採六·三·三制，實為美國制，20世紀初中國引進美國的一直沿用至今。幼稚園學制則更為多樣，有一年的、有二年的、有三年的，間中還有二年半的（春季始業）。為此，在行政管理、財政制度、課程設置、學年分段、成績考核、升留級標準、獎懲條例、德育內涵、品行評定、教學大綱、教學要求、教材選編、教學方法……在大同之中，有其小異；加上行政作風不同，往往呈現出各自特色，特別是歷史悠久，生源固定的學校特色尤其明顯。

又例如澳門歷史上出現了三所護士學校，一屬美國制，一屬法國制另一為葡國制，不但各自按其學制標準培養人才，各自的畢業生都有不同的就業渠道，但又可以在澳門當地的公立醫院或私人診所中合作共事，其靈活性和適應性也是明顯的。又例如澳門的高中畢業生，從來都是多渠道升學的。90年代後，其升學的三條主渠道是海峽兩岸和本澳大學、學院。一個畢業生可以同時報考多地、多校，總有其適應性，因而升學率不斷上升，超過80%。（詳見劉羨冰《澳門多元化培養人才的道路》1992）

（四）民間辦學的主動性和學校規模的差異性

長期以來由於澳門政府對華人教育採“撒手不管”政策，公共教育資源集中官校，因而澳門私校林立，成為教育的主體，官校反而成為補充。私校的各自背景不同，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不同，因而全澳90%以上的學生就讀於各個不同的私立學校中，辦校實體有教會、有社團、有氏族宗親會、有街坊組織……各校管理、師資、設備和校舍都十分懸殊，差異很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有的已經頗為先進，有的還在廟宇裏進行複式教學，甚至還有“卜卜齋”塾師一人教十多名七、八歲至十來歲的學生；到了90年代，部分學校走向現代化，利用多媒體電化設備，但仍有十分簡陋的學校；1999——2000年度，澳門學生最多的學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合起來超過8,000人，但也有學生僅45人的學校。不少私校大多數班級超過60人，官校卻普遍十多廿人一個教學班，這些差異性不追本溯源，是難以理解的。儘管到1997年推行十年“普及傾向免費教育”，且大多數的私校都加入了公共教育網，成為公費教育的學校，但設備條件差異仍然很大。

（五）個別的超前性和普遍的滯後性

由於教育資源的不足，澳門低收費或不收費的學校佔比例不少，澳門教育普遍比鄰近地區落後，這是事實。但由於種種原因，澳門教育又出現不少個別超前的事實。聖保祿學院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華籍修士鄭瑪諾1650年到羅馬留學，比容闈出洋早了200多年，1903年陳子褒在澳門率先收女生，比經元善在上海辦經正女學還早了5年。1906年，天主教慈幼會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讀教育，並於

1964年，引進英制工業中學，在慈幼中學近百年的校史中，兩度超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澳門人才一向缺乏，但抗日期間名校林立，廣東省優秀教育人才一度集中，使澳門教育大大提高質素，也影響深遠，這也顯示其超越性。在後過渡期創出高中畢業生80%以上升學的奇蹟，超過經濟比澳門發達的地區，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學制的多元化，教育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1980年本澳嶺南中學率先開電腦課，比鄰近地區早，濠江、勞校、培正也在1981年開設，也較超前。

（六）較多的辦校自立性與較少的行政規範性

澳門私校經歷了長期的獨立自主、自生自滅的歷程，適應了不同階層、不同要求的學生家長，辦出各自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傳統風格，創造了自己生存發展的價值，呈現出較強的自主性。而總整體來看，規範性是不足的。1987年澳門進入過渡期，澳門政府才開始制訂教育法規，1991年頒佈《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即原教育綱要法），至今，該母法中列明的有關輔助法例仍未全部完成，因而可以肯定，缺乏教育規範性這一特點，起碼在21世紀初仍是存在的。不管怎樣，科學性和專業性的增強，是官方和民間的共同目標，澳門教育的發展，已慣於寬鬆自主的行政管理條件，要加強行政管治的統一性和規範性，必須首先建立教育科學性和專業性的社會共識，特別是教育行政和學校之間的共識，才能引導教育健康發展。私校的自立性與教育行政的規範性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不但決定上述的教育特色的消長，更重要的是決定澳門教育未來的路向。

對於澳門教育特點的研究，目前仍處於一個初級階段，更多的特點仍有待發掘，特點之優劣，也不是一概而論的，總有其兩面性、多重性。例如澳門基礎教育20年來不斷發展，由三萬多增至十萬人，居民文化素質應有很大的提高，這應該是一種必然的結果；但又因人口流動過速，流出高文化者為多，流入以低文化者為主，甚至文盲不少，因此整體上提高不快，而文盲比率20年間反而提高；又例如90年代初至今，由於回歸效應，高中生升學比例大大提高，八年間持續80%的升學率，是一件外人十分羨慕的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外依賴性的提升又不是一件絕對好事，外面升大入學試的指揮棒對本澳教育壓力將增大。如本澳長期私校為主，私校間競爭性強，有如進入了市場競爭機制，但80年代開始學額不足，競爭性減弱，家長選擇性也受局限。要辦好澳門的教育，特別是要改革澳門的教育，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澳門教育的特點是必要和重要的。

2000年8月修訂

